

# 评话小说通论

董国炎 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平民文学的  
两次兴起——评话小说研究」结项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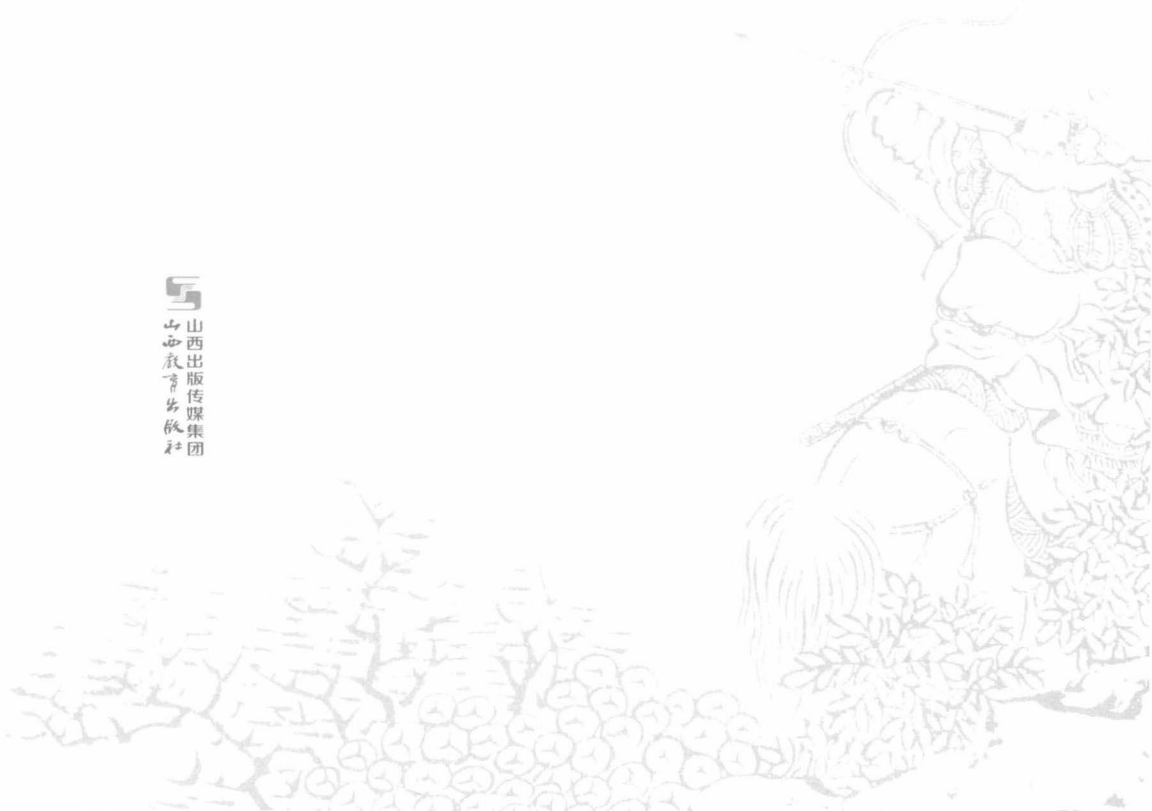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小说评话 通论

董国炎 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平民文学的  
两次兴起——评话小说研究」结项专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话小说通论 / 董国炎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440 - 9667 - 6

I. ①评… II. ①董… III. ①评话 - 研究 - 中国  
IV. ①J826. 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4956号

## 评话小说通论

PINGHUA XIAOSHUO TONGLUN

---

---

责任编辑 郭志强 郭文礼 薛海斌

复 审 刘晓露

终 审 杨 文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蔡 洁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

字 数 585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9667 - 6

定 价 128.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351-4729718。

# 序 一

黄 霖

董国炎教授致力于评话小说的研究，而且坚持从一个角度阐述重要的理论，就是从“平民文学两次兴起”作为核心特质这个角度来阐述评话小说的兴起和发展，这种理论阐释很有意义，但是研究难度也很大。“平民文学两次兴起”这个理论认识是鲁迅先生最早提出的，然而，虽然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但却没有进行阐释。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而且“平民文学兴起”的观点与长时期以来流行的主流观点有差别，所以导致这个问题九十多年来无人正面问津，也一直没有人对平民文学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对平民文学观点，敢于正面展开研究，不回避理论难题，是需要勇气的，这种角度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评话小说通论》以宋代以来的评话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既研究评话小说文本，也研究平民大众参与的口头讲唱艺术，既扩大了常见的研究范围，又显示出一种跨学科性质。这种研究，对于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具有应用价值。

这部著作字数较多，有近五十万字，作者还有相关论文数十篇，其成果显得厚重扎实。作者对平民文学概念的内涵外延，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研究，特别注重比较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中国市民与欧洲市民的共性之处与个性异同之处，视野较开阔，不囿于成说，力求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增强了学术说服力。关于平民文学与文人文学、平民文学与游民文化等关系的研究，也都颇有价值。这部著作中还注重参考日本京都学派和韩国金学主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多角度地观察研究对象，取得了较好的旁证效果。著作中这类性质的论证几次出现，纵横比较论证，这种研究方法是有意义的。

这部著作认为，宋元时期说书人有意识地把讲史小说分为“史书”和“新话”，凡有正史依托的讲史故事被称之为史书；凡没有正史可以依托的“现代人物”故事，特别是张、韩、刘、岳，即抗金名将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等人的故事，则被称



为“新话”。这种方法十分简捷，切合实际，便于操作。中国文化富于史官传统，重视历史著作，讲史小说发达有其必然性。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历史著作，尤其是正史类著作的问世经常受到迟滞。说书艺人创作的讲史故事，经常没有历史著作可以依托。但这种讲史故事容易受人关注和欢迎，被称作“新话”，它既被归属于讲史小说范围内，又被认为是缺乏依托的新编话本。中国小说史上有很多作品，属于假历史小说真英雄传奇故事。怎么认识这类小说产生的土壤和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一个困惑学术界很久的重要问题。“史书”和“新话”本来都出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不过前者有文献依托，后者更多依赖虚构，依赖说书人来发挥创造力。二者的风格与性质虽有差别，但是同源，也都分别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

这部著作对《五代史平话》的研究很独特，也很有意义。《五代史平话》研究长期偏冷，这部著作却把它作为重点研究，不仅填补了历来研究的薄弱之处，并且取得了很多重要收获。著作中提出若干新的观点，例如指出“五代史”故事的说书分为东西两派发展；东派五代史故事后来冷落了，但却成为《水浒传》的重要来源之一；《五代史平话》可以反映平民文学崛起，而且系统地展示了平民英雄发迹变泰的模式。这些都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著作中虽然提出这些观点，但是能否被接受，能否成立，都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需要时间的检验。不过，敢于提出并论证新观点，敢于研究一些历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古代文学研究长期集中于少数作家作品，而忽视了其他作家作品，这部著作有意矫正这种现象，这种意识和努力应该被肯定。

这部著作以扬州评话作为清代评话的代表，并对其展开重点分析的思路也是可取的。前辈学者胡士莹先生曾多次论证扬州评话在清代评话发展中具有中心地位，本著作研究当中既注重对普遍层面的整体分析，也注重对个别典型的深入解剖，这也切合清代评话发展的实际情况。这部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平民文学两次兴起——评话小说研究”的结项成果，该成果已经在2012年3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优秀等级，我乐于看到这部著作早日出版。

# 序 二

齐裕焜

董国炎教授研究评话小说，既研究评话小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对评话小说的性质、评话小说与其他古代小说的关系、评话艺人与文人作家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都努力进行理论探讨。这种研究路径，就是一直受到提倡的史论结合模式。史论结合的研究确实有难度，但是很有价值，值得为此努力。现在这部《评话小说通论》，既研究评话小说的发展，同时又紧密结合平民文学兴起和再兴起这种文学属性问题展开研究，这种史论结合的课题无疑颇有理论难度。

研究评话评书类作品的发展，紧密结合平民文学兴起和再兴起的特定文学性质进行评价，这是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首先提出的观点和路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提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鲁迅先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观念以及平民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按鲁迅所说，宋人话本是平民文学的第一次兴起，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是相隔七百年之后平民文学的再次兴起。鲁迅这一如此重要的观念提出之后，竟然在九十余年缺乏反响，学术界也可能是在回避这个问题。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是以否定性评价为主，形成研究禁区，文献材料也比较少，研究难度比较大。怎样把握平民文学提法，平民文学与广泛流行的市民文学提法是什么关系，二者具体怎样处置，则具有理论难度。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很多，鲁迅先生也没有论证这一观念。这一观念被长期搁置。

董国炎教授撰写的《评话小说通论》没有回避各种理论难题，比如对平民文学的提法。这部著作对平民文学的提法展开了内涵外延的论证，而且专门与市民文学提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市民文学提法，但市民文学提法是怎样产生的？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呢？

这部著作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历史及其功能，比较了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形成历史和



功能。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差别相当明显，而中国市民与欧洲市民的差别也非常明显。通过追根溯源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平民文学提法更符合中国国情。同时，本著作也分析了中国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可能容易被读者接受。

这部著作中研究的平民文学跨越五四时期，从宋代到近现代，是同一形态的持续发展。这样看待平民文学发展历程，与学术界习惯沿用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期和分野形成差别，对于这种差别，进一步加以探讨应该是有意义的。这部著作还联系到当前大众文化，联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这部著作对小说文本研究与评书评话、鼓词弹词等说唱艺术研究都给予重视，具有一定跨学科特点，它们与本著作的理论倾向和研究方法都是有意义的。

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说书流派研究中，著作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不受以往文学史或小说史观点的束缚，不管作家作品的研究现状是冷是热，作者敢于按照自己的观念展开研究，并提出有新意有创见的看法。

这部著作重视长期以来一直冷门的《五代史平话》，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很多新观点。例如，提出《五代史平话》是宋代最重要的两部讲史平话之一，可以代表平民文学崛起，可以展示平民英雄发迹变泰的模式。《五代史平话》充分展示下层英雄反抗现状，闯荡冒险，或者投身行伍，或者栖身绿林，最终发迹变泰的历程。这些故事中的鉴赏口味都不是上层的。就反映平民文学崛起而言，《五代史平话》的价值超过《三国志平话》，它不需要标榜皇叔旗号和贵族血统，平民意义更鲜明。《五代史平话》后来遭到冷遇，陷于沉寂，是内外原因的合力所致。但是，这部作品反映的平民文学崛起的性质，并没有完全被埋没。五代史说书后来分为东西两派，《五代史平话》代表的东派五代史故事，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若干故事和精神血脉的重要源头。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可能是以往未曾有过的新见解，能否被学术界接受，现在尚不可知，但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研究态度应当鼓励。著作中关于刘知远、郭威、薛仁贵等故事的分析，都很注重挖掘平民英雄发迹变泰的性质，分析发迹变泰模式和故事模式。薛仁贵故事能发展为一种典型题材，后来衍生出薛平贵故事等，都反映出中国平民社会对这些下层人物发迹变泰故事的青睐。

在隋唐故事长期演变发展中，故事的重点人物发生转移，由隋炀帝、李世民等人物转为程咬金、秦琼等人物，隋唐故事后期书目中，《绿牡丹》异军突起，成为重点书目。这种具体的文学现象有着很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这部著作对它们都特别注意，并且坚持贯彻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

宋元说书人将讲史题材有意识地区分为“史书”和“新话”两种类型；有正史依

托的归于史书；尚没有正史可以依托的，例如岳飞、韩世忠一类故事，称为“新话”。这样就使这两种小说类型性质有差别，分别得到发展。上述这种看法富于启发性，适合阐释中国小说史发展中的某些特点。不少作品很有价值，但是长期缺乏研究，所以本著作对《五代史平话》《飞跽全传》等作品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部著作还注意普遍情况的分析与代表性个案的深入剖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注意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转换关系。对宋元平话的研究以汴梁和杭州作为研究重点，对明清时期的评话以扬州评话作为研究重点，以充分篇幅深入研究代表性作品的历史与演变及其审美倾向等问题，这种点和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董国炎教授这部著作体量很大又能自成体系，扎实厚重，富有创新价值。这部著作已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优秀等级，我期待这部著作能够早日出版。



# 目 录

- 第一章 平民文学与平民文学兴起 1
  - 第一节 关于平民文学 1
  - 第二节 平民文学在宋代兴起 10
  - 第三节 平民文艺的生存方式 22
  - 第四节 宋代说话的形式渊源及改造 27
  
- 第二章 “史书”“新话”分别发展之轨迹 39
  - 第一节 关于史书与新话 39
  - 第二节 《全相平话五种》与“史书”精神 46
  - 第三节 “新话”精神与《宣和遗事》 53
  - 第四节 民族矛盾与“水浒传” 59
  - 第五节 “水浒”故事汇集发展 65
  
- 第三章 平民发迹变泰——《五代史平话》研究 81
  - 第一节 《五代史平话》的独特之处和研究状况 81
  - 第二节 平民文学崛起的重要标志 86
  - 第三节 树立平民好汉发迹变泰模式 89
  - 第四节 平民生活故事对“世情小说”的贡献 97
  - 第五节 英雄侠义小说之萌芽 101
  - 第六节 五代史故事的分化与演变 110
  
- 第四章 平民功业坎坷多——薛仁贵故事 122
  - 第一节 《薛仁贵征辽事略》的价值和性质 122
  - 第二节 叙事方法与人物塑造 129
  - 第三节 《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的审美变化 139



## 第五章 评话繁荣的地域文化研究 145

- 第一节 扬州说唱文艺繁荣的历史渊源 145
- 第二节 扬州评话的经济文化背景 158
- 第三节 扬州评话的发展 164
- 第四节 扬州评话种类研究 182
- 第五节 扬州评话的思想和审美倾向 189
- 第六节 扬州评话的性质及其展望 196
- 第七节 扬州评话语音变化及其得失 201

## 第六章 《三国演义》评话研究 212

- 第一节 “三国”故事的说唱历史 212
- 第二节 《三国演义》与扬州评话 220
- 第三节 《火烧赤壁》评话研究 225

## 第七章 《水浒传》评话演变与《武松》 261

- 第一节 《水浒传》评话与小说的关系 261
- 第二节 不断创新的生存之道 273
- 第三节 《武松》评话的几重价值 282

## 第八章 隋唐故事与《绿牡丹》 305

- 第一节 隋唐故事的价值与文献 305
- 第二节 下层趣味在隋唐故事中的发展 324
- 第三节 隋唐故事与评话发展 334
- 第四节 《绿牡丹》的特殊面貌 342
- 第五节 《绿牡丹》与武侠小说发展 350

## 第九章 市井评话的演变发展 365

- 第一节 《飞跽全传》与市井故事的演化变形 365
- 第二节 《清风闸》与市井小说 380
- 第三节 市井小说的顽强发展  
——从《清风闸》到《皮五辣子》 383

## 第十章 从清官热到公案武侠热 391

- 第一节 清官故事盛衰变化的意义 391
- 第二节 包公成为清官文学的代表 397
- 第三节 公案侠义小说的演变 402
- 第四节 武侠小说的生成原因和生存基础 411
- 第五节 公案武侠小说转型与清官衰微 418

## 第十一章 涉及评话的几个问题 425

- 第一节 口述史小说的性质与演变 425
- 第二节 评话类小说与口述史 434
- 第三节 评话中韵文与小说中韵文 444

参考文献 454

后 记 474

# 第一章

## 平民文学与平民文学兴起

### 第一节 关于平民文学

#### 一、问题的提出

平民文学，是学术界不大使用的概念，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市民文学，相关概念则常见雅文学与俗文学，或者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著作，都是从文体特征切入文学研究，而不是从文学的人文特征这种角度切入。他们的着眼点是白话文学或者俗文学，而不强调这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文学研究的背景有很大变化，着眼经济生活背景乃至社会阶级背景来研究文学的方法盛行。市民文学的提法大量出现。在市民文学的研究中，具体观点差别很大，对市民文学时间范围的认定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晚明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市民阶层壮大，随之产生了市民文学。比如“三言二拍”中的很多作品，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施润泽滩阙遇友》之类，都是市民文学性质的作品。另一种观点则反对明代出现市民和市民文学的说法，认为只有在近代社会人口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背景下，才可能产生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学。而中国的近代化，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晚明时期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先天不足，在明清易代之际受到打击，又在清代受到保守政策压制，始终未能生长起来。所以，要谈论中国的市民文学，只能针对1840年鸦片战争



以后。这两种观点的讨论中都大量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而对文学本身的分析却被淡化了，这样做使问题很难被把握，这就使很多文学研究者对这类问题望而却步。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全面活跃，多种观点各抒己见，从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展开研究，有利于认识的深入发展。随着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对市民文学的研究逐渐升温，对分歧问题的讨论也逐渐深化，而哪些人的创作属于市民文学，却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到底从何时开始，也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有人主张从鸦片战争开始，有人坚持从晚明开始，也有人认为从宋代开始。这些分歧观点受到史学界的影响，文学研究者很少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但运用概念比较随意。

有关市民文学的研究也比较多。1997年出版的谢桃坊所著《中国市民文学史》是第一部中国市民文学史，具有创新意义。其他有关断代或者文体性、地域性市民文学的研究，陆续出现不少。有关平民文学的系统研究却难以见到，而且平民文学这种提法仍然缺少关注。

实际上，平民文学概念提出甚早。20世纪20年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就明确提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这番话很简要，但是明确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还指出宋人话本小说是平民文学初兴、清代武侠小说是平民文学再兴。这个重要观点自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至今九十余年，但论其反响，却是一种长期沉寂的现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学术话题。

鲁迅的观点素来影响很大，有很多观点被人们展开详细解释甚至过度阐释，然而平民文学的观点，好像没有多少人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人明确反对鲁迅的观点，即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侠义公案小说受到批判的时期，也无人对鲁迅此说法提出异议。鲁迅这个观点问世九十余年，处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特殊状态中，可谓中国学术活动中的有趣现象。实际上，人们对鲁迅这个概念可能不认同，却又不展开讨论，这其实不利于学术发展。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鲁迅说得太简略，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他有关平民文学的系统观点长期不为人了解。原因之二，可能在于观点本身的挑战性和风险性，既涉及平民文学这一概念如何把握，还涉及我们对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看法。有些问题是以往从未研究过的，有些问题存在很大分歧，鲁迅的观点与流行观点明显不同，导致人们不愿陷入这些风险问题中。

确实，鲁迅有关平民文学的观点至少涉及三个难题。第一，从具体评价而言，作

为平民文学再兴标志的清代武侠小说曾在几十年间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说这些武侠小说是平民文学，需要突破很多认识藩篱才能得到肯定，还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评价平民文学。第二，从文学史观念来看，鲁迅勾勒出一条历时七八百年的平民文学兴起、再次兴起的发展脉络，这条线索实际还有延续。这与我们对封建时代文学演变的总体把握能否相容？第三，从文学史分期和文学阶段性质的界定而言，我们久已从五四前作了一个根本的截断，在此终结了封建时代的文学。五四之后就是全新的白话革命文学。但是，清代后期兴起的武侠类小说不断延续发展，并没有终止于五四之前。如果承认这条平民文学发展线索，可能会搅乱原有的文学史蓝图，这会造成接受心理的障碍。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鲁迅提出的平民文学观念及其发展脉络的评述都被长期搁置。也许，正因为提出这一观念的人物是鲁迅，在特殊环境中，无人对鲁迅进行驳斥，于是不议不论，置之不理，形成一种奇怪的沉默。

总体来看，平民文学观念及其发展问题非常重要，很值得研究。而鲁迅言之过简，对平民文学兴起的原因、平民文学内涵外延、前后脉络均未论及，也容易使这一观念被忽略。今天，如果想深化文学史研究，在这个领域就不能回避上述问题。为此有必要就平民文学兴起和再兴的相关问题，作一些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探讨。

## 二、平民文学，还是市民文学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宋元明清文学研究中，概念使用方面存在一个重要分歧：采用市民文学概念为好，还是采用平民文学概念为好？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分歧。它所涵盖的问题很多、时间跨度很长，特别是在对宋代以来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的研究中，往往会遇到这两个概念。两个概念的分歧一直存在，虽然没有出现激烈争论，但是混乱和矛盾无法避免。

笔者认为，市民文学概念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出现，既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受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学中，市民文学概念产生时间很长，影响很大。在欧洲中世纪，贵族领主控制的封建城堡，与自由民居住并控制的商业手工业城市，存在着经济制度、政治主张、文化思想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甚至酿成激烈冲突和对抗。在商业城市背景下产生的市民文学，抵制封建领主，向往自由贸易等经济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这种市民文学与19世纪欧洲文学一脉相承。欧风东渐以后，市民文学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市民文学概念，不仅与西方文学史相呼应，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盛行的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这一理论体系联系着城市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壮大、资本主义萌



芽与发展等一系列的理论支点。市民文学可以纳入这一理论体系，可以联系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诸多学科，与诸多学科理论互相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与进步性。

平民文学概念，主要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中国国情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别，隋唐以来贵族与平民的区别逐渐不明显。中唐以后门阀士族制度不断被摧毁，这有可能造成一种假象，贵族平民之区别完全不适应中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门阀士族虽然在中唐以后逐渐衰亡，但所谓阀阅之家书香门庭与平民大众的区别仍然存在，讲究门当户对原则一直广泛流行于中国社会。实际上，唐宋元明清各代法律，对官宦人家读书士子的优待，对贱人、乐户、家生仆役等最下层民众的歧视始终严酷，通婚治罪的法规长期存在。这些现象反映到文学中，文人士大夫与普通人的差别，在精神层面上就有不少差异。到五四运动时期，继续巩固推翻帝制的革命成效，进一步提倡民主与科学，其实都联系着平民大众的地位。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文学革命论、文学八病说，致力于反对贵族的、古雅的文言文学，倡导平民大众的通俗的白话文学，等于是在精神层面上巩固中国社会进步的成果。鲁迅把平民文学概念具体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的平民文学初兴、平民文学再兴的论断，是一个涵盖中国小说史的宏观论断，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

平民文学和市民文学，表面看仅仅是提法不同，实际上关系着重要的观念差异。市民文学观念得到欧洲文学史以及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持，显得底气很足。改革开放以来，市民文学研究得到加强，出现了若干专门著述。在此举出两例，一例是我熟识并且敬重的谢桃坊先生1997年出版《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例是毕业于扬州大学的古代文学博士方志远先生，200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有趣的是，方志远原来是历史学硕士，博士毕业后很快担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以及中国明史学会的副秘书长。他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是跨学科的成果。

从研究著述来看，平民文学理论逊色于市民文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但是理论毕竟是第二位的，历史事实才是第一位。从历史事实出发，平民文学观念更适合中国国情，而市民文学观念拿到中国环境中，明显存在若干生硬甚至混乱之处。市民文学观念来自欧洲，但是欧洲的市民不同于中国的市民。在欧洲中世纪，商业的的市民的城市与封建领主的城堡对峙，各有自己的经济主张和政治主张。欧洲市民的进步色彩明显，他们追求“城市宪章”和“市民权”，本质上是合理合法地成为自由民，形成国中之国。他们追求的市政厅和议政制度，对中国城市居民是完全陌生的。中国城市居民的情况，实际可以分为很多阶层，各阶层处在不同的生存形态和意识形态中。

自古以来，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性都邑，是帝王诸侯和官府的统治中心，是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社会上层人物的居住中心。中国城市居民的构成相当复杂，按照人们以往的市民文学观念分析，只有下层市民才是市民。所以，凡主张市民文学观念的著作，往往首先要对市民进行划分或者定义，规定哪些城市居民算作市民，哪些城市居民不算市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商人、工匠、妓女之类被算作市民，通常没有争议。而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怎么划分，经常有分歧。谢桃坊先生《中国市民文学史》第一章首先在城市居民中划分市民：

市民阶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代表新的商品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手工业者、商人和工匠。坊郭户中的地主、没落官僚贵族、士人、低级军官、吏员、以及城市的统治阶级附庸，都不应属于市民阶层的；只有手工业者、商贩、租赁主、工匠、苦力、自由职业者、贫民等构成坊郭户中的大多数，他们组成了一个庞杂的市民阶层。（第十三页）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展开正文，也以很大篇幅定义市民。他把市民划分为三类：一、城市知识分子；二、工商业者；三、妓女、游民及其他身份的市民。方志远还进一步分析：明代后期全国的三五十万生员“绝大多数都在各地城市为市民”（第九十二页），再加上各种私塾、族学、社学，当时的知识分子型市民不下一百万人。

以上两位先生的不同之处好像主要围绕城市知识分子怎样划分，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这种划分的关键在于平民性程度，具有平民特点的城市居民算作市民，没有平民性的人，居住在城市里也不算市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确实一直不容易划分，有贫困潦倒的孔乙己式读书人；也有儒雅华贵的文人绅士，交接官府，仆役成群，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远超过一般财主。看来单纯以入仕不入仕划分知识分子，不入仕就算作市民，这样划分是否合理还值得考虑。商人的划分也存在矛盾。总体上说，虽然商人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方向不同，商人推进商品流通，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但是商人的生活状态和政治态度有很大差别，有的商人紧密依赖官府，同时奢华惊人，他们的进步作用也因此受到影响。例如清代中叶以前，扬州盐商就是如此。道光朝以后盐业改制，扬州盐商失去特权，时间不长就没落了。扬州盐商的特殊地位决定大多数盐商政治态度与官府一致。扬州盐商奢华惊人，《红楼梦》中奢侈如贾府也只养一个昆曲班子，扬州大盐商江春等人却家养花部、雅部两个戏班子。很多大盐商有官衔，甚至有穿黄马褂者，江春就是如此。清代小说中还写到一些特殊的“皇商”，例如《红楼梦》中的薛家，就属于这种特殊商人。也许因为商人的地位相差悬





殊，哪些应该算作市民，也还需要划分，谢桃坊先生行文中采用“商贩”一词，“商贩”当然是指小商人，看来他把小商人归于市民，大商人好像不在此列。

曾有人讨论过，致仕之后仍然生活在城市中的退休官员，已经成为一般文人，算不算市民呢？城市中衙役仆役这个阶层，人数不少，按照谢桃坊先生的划分，他们可能属于“城市的统治阶级附庸”，不在市民之列。但是，按照方志远的划分，他们好像属于其他身份的市民。诸如此类的问题很繁杂，尽管我们只列举了一小部分，但是可以看出，划分中国市民实际需要两个标准，既要符合生活在城市中的地域要求，又要符合社会地位标准。城市下层民众才能算作市民，实际上这是一种平民标准的选择。中国的市民文学提法，存在较多模糊甚至矛盾之处。相比较而言，平民文学提法可能更合理一些。

### 三、平民文学的范围

鲁迅对平民文学的时间范围有一些说法，初兴时间限定在宋代话本时期。这一限定很有道理，等于强调了平民文学的成熟程度。宋代话本之前，当然也有平民，也有若干平民的文学，但是总体成熟度不够，还不能称之为兴起。平民文学在宋代兴起，有深厚的经济政治原因。所谓总体上基本成熟，应当指平民文艺能够全程把握某种文艺类型，并占领一个重要舞台。宋代说话从作品的创作、表演、传播、继承以至消费接受，乃至修订、刊刻、销售刊本和购买，都处在平话艺人、勾栏主人、书坊主人和相关民众把握中。东京和临安都有专门说书的书棚，而且听众人数很多，甚至风雨寒暑都不受影响。书台上坐着说话人，台下听众主要是各类平民，包括商贩、工匠、衙役、军卒、游民等三教九流人物，在紧张聆听中，在哄笑叫好或者责问声、唾骂声中，形成了创作和接受相交融的过程。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就是说话人和听众，在这种交融中都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应当说，这是一种平民文艺基本状态，确实反映出平民文学之兴起。

有一部分著述谈到市民文学、平民文学等概念，对于概念范围的把握相当宽泛，结果显得市民文学、平民文学好像都是古已有之。这种宽泛其实泛而无当，不得要领。虽然平民大众自古就有，城市也很早就有，引证先秦文献，齐国都城临淄高度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引证汉魏时期“两京”“三都”之类辞赋作品，当时文艺娱乐行业已经很发达。但这样引证并不能证明古代市民文学发达。《诗经·国风》、汉乐府、南北朝民歌等作品固然表现了平民生活，然而作者或是官府派出的采诗之官，或者经过上层文人删削整理，所谓孔子删诗，成了《诗经》的一种光荣。当时搜集这些作